

重回葛兰西的“情感维度”*

谭光辉

摘要：葛兰西的霸权理论赋予情感以重要的地位。重回葛兰西，是将情感看作一个社会建构的维度，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组成三元话语结构，社会的发展就是这个三元结构的整体位移，这可能是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发展的新方向。

关键词：情感决定论 葛兰西 社会建构 经济基础 上层建筑

Gramsci's Emotion Dimension Revisited

Tan Guanghui

Abstract: Gramsci's hegemony theory gave emotion an important position. To revisit Gramsci is to regard emotion as a social construction that forms a trialistic discourse with an economic base and superstructure.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s a whole takes this trialistic structure, which may provide a new direction for semiotic Marxism.

Keywords: emotion determinism, Gramsci, society construction, economic base, superstructure

DOI: 10.13760/b.cnki.sam.201602005

一、葛兰西对情感问题的重视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时候，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对个人情感的漠视，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文学作品情感表现与接受的符号现象学研究”中期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16XZW007。

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引起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马克思，恩格斯，1995，p. 275）。王晓升将其表述为“人和人之间的情感关系、文化上的认同关系消失了，所有人都成为市场上的‘产品’等待出售，所有人都必须把自己作为商品在市场上‘出售’”（2013，p. 365）。由于人的物化，情感在社会建构中的作用就可以忽略了。这个定调式的预设，造就了马克思的伟大发现，同时也让不少人误认为社会建构无需情感的参与。

然而，马克思的这个表述暗含了另外一个重要的内涵：资本主义社会因不重视人的情感而应该遭受批判，所以理想的、正常的社会建构就必然有情感的参与。列宁指出：“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1988，p. 117）马尔库塞认为“就客观条件而言，作何选择（法西斯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系于人们的思想和愿望，意识和情感”（1982，p. 102）。因此，情感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之一。但是对该问题的重视度不够，可能导致“政治问题变成仅仅只是机械的技术问题”（Laclau, Mouffe, 2001，p. 10）。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研究社会结构时拒绝情感干扰。例如恩格斯称“情感社会主义者”莫利斯为“感情用事的社会主义者”，他“完全受无政府主义者的控制”。（马克思，恩格斯，1975，p. 472）因为在莫利斯的“社会实践、艺术创作和思想构建中，‘情感’是一种驱动，一种灵魂。这种‘情感’使得莫里斯游离在浪漫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于文杰，2014，p. 206）。过于重视情感，可能导致社会理论情感化而不具科学性，所以分析社会时就应杜绝情感的干扰。然而，社会理论重视情感与否并不意味着与其产生的情感效果有必然关系。

雷吉斯·德布雷比较孔德和马克思的区别时，指出了这个差别：孔德“特意要使事情热起来（通过让精神从属于心灵、感情、女性因素），结果留下一个冷客体”，马克思“不顾一切想要事情处于‘冷’的状态，将女人、感情、偶像崇拜看作是微不足道的或次要的东西加以摈弃，却通过获得民众而引发热量释放”。（德布雷，2014，p. 18）从感情出发，可能并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从理智出发，反而能够最大化地激发情感。乔治·瑞泽尔说，“孔德是非常‘反智的’”“如果孔德是个优秀的数据分析者，如果他更多地接触历史和当代世界，他的理论可能就不会如此令人生厌了”。（2014，p. 125）孔德不重实证，从情感出发解决问题，导致理论的不完善。这一点，恰如恩格斯批判莫利斯。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对情感的社会作用论述较多的人物是葛兰西，他非常重视情感在统治阶级霸权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安东尼·奥罗姆分析说：“阶级统治之下的霸权，是建立在大多数民众所持有的高度复杂而又广泛存在的情感之上。”（2014，p. 30）在《狱中札记》中，葛兰西反复讨论了诸多通俗文学作品对人民情感的影响，例如，“把‘不应收归国有的财产’的碑铭和宗教界满足于它的特殊文学不受批判的分析的情感放在一边，我们必须指出，在谁也不研究、谁也不想以批评态度对待的民族与人民文化生活中，存在着另外一个领域，正是报纸附刊连载小说在本来意义和广义上的领域”（葛兰西，1983a，p. 490）。这是因为，“商业小说的成就表明了‘时代哲学’的内涵，通过商业文学，可以探究到什么样的‘情感’和‘世界观’占据、支配着沉默的群众”（董学文，2013，p. 282）。简单地说，在葛兰西的“意识形态”概念中，情感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而且居于要位。甚至于，情感可以用以区分阶层，因为“在人民当中，不同的阶层有着迥然不同的文化教养，不同的阶层热衷于迥然不同的‘情感’、迥然不同的民间‘英雄典型’”（葛兰西，1983b，p. 142）。

在《实践哲学》中，葛兰西论述道：“知识分子的错误在于，相信人们能够在没有理解，甚至在没有感情和没有热情的情况下去认识（不仅认识本身，而且还有认识的对象）”“人民不能在没有这种热情，没有知识分子和人民一民族之间的这种情绪上的联结的情况下，去创造政治一历史”。所以，“如果知识分子和人民一民族、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是以有机的融贯——在其中，感情—热情变成理解和认识从而变成知识（不是机械地而是以一种能动的方式）为特征的，那时，而且只有在那时，才是一种代表的关系。只有在那时，才会发生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个别要素的交换，才能实现作为一种社会力量的共有生活——并创造出‘历史的集团’”。（1990，p. 109）这个论述相当彻底，情感被视为连接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纽带。一切知识都是在情感的推动下得到的，而且知识本身就是情感的推演，进而，“历史的集团”也是由情感创造的。社会集团、霸权的形成，初因正在于情感。“因为对于大众感情要以它们在其中客观表现出来的那种方式去加以认识和研究，而不要把它们看成某种可以忽略的东西和在历史运动内没有活力的东西。”（p. 110）

葛兰西放弃了“从认识到理解和到感情”的路线，主张“从感情到理解和到认识”的路线，与他反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主张上层建筑决定经

济基础的逻辑思维方式有着必然的联系。我们同样不可忽略,任何情感的产生,并非无缘无故,与认识、理解有着必然的联系,这二者互为因果,而非某条路线正确则另一条路线必然错误的二元对立关系。

二、葛兰西情感论的未尽问题

表面上看,葛兰西的情感论与孔德的社会理论有相似性。孔德认为,“一个和谐的社会是建立在一致同意 (consensus) 的基础上的,后者是一种共同属于某一道德统一体的情感”,因为“家庭、教会和共同体 (community) 是社会的核心,因为正是在这些场合,爱、责任、忠诚和敬仰等感情压制了人们的私心”(柯林斯,马科夫斯基,2014, p. 45)。即在社会情感与个人情感相遇的时候,后者服从于前者,从而组成社会。葛兰西认为是国家创造了被统治者的一致看法,而创造一致看法的途径是教育,“国家成了‘教育者’”(1983a, p. 219)。国家依靠教育、指导,使被领导者同意他们的领导。从这个角度看,葛兰西正好解释了孔德,国家教育人民从而使他们获得社会情感,该情感压制了私人情感成为维护国家统治的基础。这有点像对叔本华唯意志论的解释:“我们并不是因为发现了欲求某个事物的各种理由才去欲求这个事物,而是因为欲求这个事物才去寻找欲求它的各种理由。”(杜兰特,2004, p. 201)用在葛兰西的国家理论中就是,人并不是因为属于某个阶层才会产生这个阶层的情感,而是因为具有这个阶层的情感才意识到自己属于这个阶层,进而才会有关于这个阶层的认识并引发行动,因为“信仰、一致看法 (consensus) 和赞同是构成国家权力的基础,而不是国家权力是信仰、一致看法的基础”(Bergesen, 1993, p. 4)。现代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教育使人民具有对统治阶级的认同和情感,从而构成国家权力的基础。国家机器的工作方式,不再是经济政治的强权控制,而是阿尔都塞称之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东西。只不过,在葛兰西的理论中,情感是构成意识形态的重要部分,而在阿尔都塞的理论中,情感的作用被讨论得极少。

另一种观点认为,人不是因为不同的情感取向而区分为不同的阶层,而是因为经济、政治、文化地位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情感。例如亚当·斯密认为,“人类正是在对富人和有权势的人的所有激情的认同的倾向上建立起等级的差别和社会秩序”(2014, p. 57)。因为富人能够获得世人对他的注意,所以“他对他的财富对他所能获得的其他好处更加热爱。相反,穷人为自己的贫困而感到羞耻”(p. 55)。即是说,阶级情感产生于经济基础和人们对该经济基础的不同倾向。这样,经济基础以及人们对该基础的倾向产生了阶

级情感，该阶级情感演变为意识形态，又反过来形成“历史的集团”（阶层），该阶层又因拥有相似的情感而创造历史以及知识，该知识进一步作用于经济基础，周而复始。

葛兰西的国家理论讨论的对象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权问题，在一定范围内有其正确性，然而又具有片面性。斯蒂夫·琼斯认为，“由于他将历史主义、唯心主义和能动作用（相互矛盾地）相混合，葛兰西更容易受到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攻击”（2014，p. 153）。葛兰西的主要问题在于，他将情感和一致看法视为统治阶级教育的结果，没有论述情感和一致看法与利益、个人爱好的相关性。情感之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决定或导致理解、知识，乃是由于存在一个让情感可以起这个作用的环境。情感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巩固统治的作用，但是这个作用是有限的。而能让情感起作用的外部“自由”环境，可能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葛兰西关于情感的论述的意义在于他考虑到了情感在社会建构过程中的作用，但是他没有充分考虑社会在情感形成过程中的作用。

早期符号学家更愿意把情感看作一种具有本原性意义的存在。《劳特利奇符号学指南》总结了索绪尔的相关思想，发现索绪尔注意到“有一种感觉和情感的符号学，它的目的是把对生活更为真实的感觉以及情感层面上的意义体验考虑进来”，所以，“我们看到了今天所有符号学流派所达成的见解：所有人，时间上相同而道路不同地，都有自己的研究日程，面对本性、情感和激情诸问题”。这是因为，在索绪尔那里，情感被看作“预先地置于人们珍视和看做有机体的那种存在范畴之中”。（科布利，2013，p. 128）从这个意义上讲，葛兰西的观点就与索绪尔保持了一致性。

苏珊·朗格的想法与之类似。她认为，“任何美丽的事物激励了我们的时候，我们就直接地感觉到情感形式。用这种方法感知的对象具有一座庙宇或一块纺织物所展现的相同的幻觉神韵，从物理意义上说，它与鸟雀、山岳是同样真实的”（1986，p. 459）。所以说，情感的形式是一种真实的存在物，具有本原性的意义，因此她被认为是“开辟生命情感符号学之路”（吕艺生，毛毳，2012，p. 241）。不过，朗格没有把情感当作知识的来源，这一点与葛兰西就有了相当大的区别。

20世纪末，法国学派的格雷马斯、封塔尼耶、埃诺、科凯等人展开了关于情感结构的符号学研究。其中，格雷马斯和封塔尼耶合著的《激情符号学：从事件陈述到感觉陈述》是标志性成果。他们首先建立了激情符号学的叙述语法、安排和意向性理论、方法论，然后讨论了“贪婪”的语义构造、

情态建构、感受性与伦理的文化现象学、将贪婪置入话语的方式等问题，然后讨论了妒忌的构造、语义建构、主体间性、文本置入等问题。在格雷马斯等人看来，情感并非一种不可再分析的存在，而是符号和叙述的结果或意义所在。换句话说，情感不但是有原因的，而且有一定的结构。既然情感是有结构的，那么人的存在环境以及人对该环境的叙述和态度就是情感产生的原因，任何情感不可能不与人所在的社会和环境产生关联。这样，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就需要在社会与情感之间建立联系：社会决定情感的产生，情感决定社会的建构。

三、重回葛兰西：情感与社会建构之间的关系

马尔库塞注意到，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把“‘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看作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但是感觉也将成为新的（社会主义的）合理性的‘根源’”（马尔库塞，1982，p. 131）。就是说，感觉（或情感）的解放依赖社会的解放，而社会的解放的合理性也依赖情感的解放。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情感与社会建构有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但是，在这一理解方式中，情感并未被解释为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并列的维度，虽然实质上有这样一种关系。

情感大体上可以分为个人情感和社会情感。个人情感的形成有个人和社会的原因，社会情感会极大地影响个人情感的形成。个人情感也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个人关于自我与自然的情感，另一类是个人关于社会的情感。关于自我与自然的情感与关于社会的情感之间有相互影响关系。“神经症患者之所以患病，是因为他们缺乏同类之间的认同感和社会责任感”（阿德勒，2014，p. 5），说明关于社会的情感影响关于个人的情感。另一方面，对于那些自闭自卑的人而言，“生命意味着：保护自己不受伤害，把自己圈起来，逃离别人不受损害”，而对于那些健康阳光的人而言，“生命的含义在于对同类感兴趣，作为团体的一分子，为人类幸福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阿德勒，2014，p. 5），说明关于个人的情感影响关于社会的情感。

从情感建构社会的方面看，要取得革命的成功，不但要用自己的情感去影响人民的情感，而且要体会人民的情感，从他们的情感要求出发。张如心认为毛泽东非常善于“深刻地体会中国广大人民的情感和要求”，所以才能“正确地掌握中国历史与中国革命发展的规律”（2011，p. 150）。《汉书·元帝纪》云：“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吴礼权认为“此言劝统治者要尊重人民的情感与天性，顺势而为，不可逆向操作而失民心”

(2014, p. 299)。这些例子都充分说明了情感在社会建构中的核心作用。

社会情感的酝酿可能有着复杂的影响因素。比如卡赞斯坦等人发现,冷战期间,欧洲公众对美国的情感波动可以用来解释反美主义(意识形态)的起伏波动,而反美主义情绪波动又似乎与国际政治环境的演变有关。其中,至少有四个重要因素会影响欧洲四国大众层面的反美主义:“二战中与美军直接接触的经历”“战后美国的政策”“冷战前景”“欧洲四国糟糕的经济局面”(卡赞斯坦,基欧汉,2015, pp. 61-66),第一点是直接的情感记忆,第二、三点是政治/意识形态因素,第四点是经济原因。这说明,影响情感的因素不是单方面的。当然,情感影响的对象,也不是单方面的。

重返葛兰西,不是唯情感论,而是在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话语结构中加入一个情感的维度。情感维度的加入将彻底改变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使其变得更为完善和科学。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情感三者,形成链条式话语结构圈。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为一组,上层建筑与情感为一组。前一组的关系与后一组具有结构方面的一致性。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一样,上层建筑和情感也有一种互相影响、难分彼此的结构关系。一般而言,人们倾向于认为情感不会与经济发生直接关系,而是通过上层建筑与经济发生间接关系。然而,后现代经济学理论已经将二者结合了起来,出现了体验经济、情感经济的转向。(杨岚,2013, p. 153)这样,三者就形成了一个比较牢固的三元关系,互相牵制,共同成为社会组织结构的要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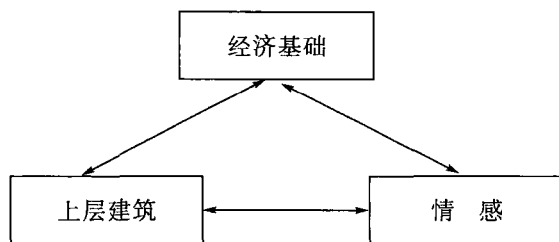
然而微观研究的结论可能常常有一些不同的结论,比如埃里克和卡里发现,“或许经济活动只是影响大众情绪的诸多因素之一,而大众情绪却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经济活动。它们之间只存在单向关系”(西格尔,2014, p. 101)。这个结论来源于对现代股票市场与大众情绪之间的关系研究,显然不能用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解释,也不能片面地用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加以解释。

情感无时无刻不渗透到人的各种经济活动和社会文化活动之中。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人都会根据情感选择思想和行动。集体情感对思想的选择形成意识形态,对行动的选择作用于经济基础和政治行为。从这个角度观察,社会情感才是左右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的无形之手。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我们党一直如此重视社会主义情感教育,德育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情感教育,思想政治工作者几乎都明白“思想政治工作必须重视情感教育”。到2016年5月,在中国知网中以“思想政治工作”和“情感教育”为并列关键词按篇名搜索,就可以查询到一万二千多篇文章。因为情感不但是建构意识形态的

基础，而且是建构经济基础的基础。又因为情感不能完全被掌控，几乎有绝对的主观性，所以需要教育加以引导和培养。

有一种观点认为，情感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一个方面。例如郭鹏飞认为“意识形态涉及信仰、价值观念、政治立场、意志、情感情绪、认知等复杂精神现象，也涉及神话、图腾、声音、动作等符号体系和象征体系。它涵括宗教、哲学、科学、政治、法律、道德、文学艺术、新闻传播等社会意识形式”（2014，p. 75）。这恐怕混淆了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关系，这一点本文暂不展开，暂时将意识形态看作上层建筑的一个方面。单就情感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而言，就很值得追究。例如郁建兴等人就认为，意识形态是理论化、系统化的社会意识，不包括情感、表象等。（2003，p. 183）两种观点针锋相对。之所以产生对立性观点，原因就是情感和意识形态分属两个领域，但是又互相影响极深。情感积极参与建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又影响人的情感取向。

这样，我们就可以建构起这样一个社会结构模型：



社会并不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二元话语结构，而是一个三元话语结构。建构这样一个模型的好处是可以避免将社会构成解释成一个冷冰冰的机械组织，而是将其解释成一个充满人文精神的话语场域。

马克思之所以将情感排斥在分析之外，并非因为他没有注意到情感的作用，也不是他本人在分析社会的时候不带情感。我们在读马克思著作的时候，可以分明地感觉到他对资本主义社会强烈的憎恨和批判，也可以从马克思主义符号学者的著作中分析出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激烈的情感倾向。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本身就是一个情感推动下的产物，那么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将情感排斥在社会结构分析之外？

四、结论：社会发展是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情感的整体位移

现代社会的发展，不再能被解释为某一个方面的发展，而是三者互相牵制、携手的整体运动。经济决定论不能解释为何同属发达国家的第一世界有

不同的社会形态、文化形态和情感取向，上层建筑决定论不能解释为何政治结构、文化结构相似的国家（比如某些伊斯兰国家）会有经济、情感方面的巨大差异，情感决定论不能解释为何同样重视社会主义情感教育的国家会出现如此巨大的经济发展不均衡。

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与情感三者，构成社会体系，三者是无中心的“多元异质链接”。但是，国家政策的执行者，却可以选择先从某一个方面入手进行改变社会的工作。比如，洋务派的实业救国着手点是经济基础，戊戌变法和新文化运动着手点在上层建筑，新中国成立初期极其重视情感，改革开放初期的“大力发展生产力”重回经济基础。历次社会变革运动，有成功也有失败，我们从中汲取的教训是，过度重视任何一个方面而忽略其他方面，社会变革都不可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只有三个方面协同影响、共同进步，才可能使社会朝向美好的方面发展。

马克思主义符号学进行到现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各种可能关系被讨论得相当充分，这致使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理论后继乏人。柏格森预言：“极有可能，另一波关于人类存在结构的理论范式”“关于缠绕人类，使人类陷入全球关系网的理论，即将来临”。（Bergesen, 1993, p. 20）这个关于“人类存在结构”理论范式的核心新元素，正是情感维度。

引用文献：

- 阿德勒，阿尔弗雷德（2014）. 超越自卑（刘伟，译）. 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
- 奥罗姆，安东尼（2014）. 政治社会学导论（第4版）（张华青，等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德布雷，雷吉斯（2014）. 普通媒介学教程（陈卫星，王杨，译）.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 董学文（2013）. 西方文学理论名著提要.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 杜兰特，威尔（2004）. 哲学简史（梁春，译）.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 葛兰西（1983a）. 狱中札记（葆煦，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
- 葛兰西（1983b）. 通俗小说的不同类型. 论文学（吕同六，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 葛兰西（1990）. 实践哲学（徐崇温，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
- 郭鹏飞（2014）. 意识形态价值论. 北京：人民出版社.
- 卡赞斯坦，彼特，J.，基欧汉，罗伯特，O.（2015）. 谁在反对美国（朱世龙，刘利琼，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柯林斯，兰德尔，马科夫斯基，迈克尔（2014）. 发现社会：西方社会学思想述评（第8

- 版) (李霞,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科布利 (2013). 劳特利奇符号学指南 (周劲松, 赵毅衡,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 朗格, 苏珊 (1986). 情感与形式 (刘大基, 傅志强, 周发祥,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列宁 (1988). 列宁全集 (第25卷)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吕艺生, 毛毳 (2012). 舞蹈学研究. 上海: 上海音乐出版社.
- 马尔库塞 (1982). 反革命和造反. 工业社会和新左派 (任立, 编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马克思, 恩格斯 (197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6卷)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马克思, 恩格斯 (199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琼斯, 斯蒂夫 (2014). 导读葛兰西 (相明, 译).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 瑞泽尔, 乔治 (2014). 古典社会学理论 (第6版) (王建民, 译).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 斯密, 亚当 (2014). 道德情感论 (谢祖均, 译). 郑州: 河南文艺出版社.
- 王晓升 (2013). 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重构.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吴礼权 (2014). 治国安邦.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 西格尔 (2014). 大数据预测: 告诉你谁会点击、购买、死去或撒谎 (周昕,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 杨岚 (2013). 情感世界解析: 兼论大学情感教育理念.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于文杰 (2014). 英国十九世纪手工艺运动研究.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 郁建兴, 等 (2003). 政治学导论.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 张如心 (2011). 毛泽东思想与作风. 斯诺, 等 (编). 早年毛泽东: 传记、史料与回忆.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Bergesen, A. (1993). The rise of semiotic Marxism.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36, 1, 1 - 22.
- Laclau, E. & Mouffe, C. (2001).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 Greimas, A. J., Fontanille, J. (1993). *The semiotics of passions: From state of affairs to state of feeling*. Minnesodo,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作者简介:

谭光辉,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符号学、叙述学。

Author:

Tan Guanghui, professor of College of Literature,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fields are Chinese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Semiotics and Narratology.

Email: sctgh@163.com.